

旅华岁月

——海伦·斯诺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旅 华 岁 月

-海伦·斯诺回忆录

华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MY CHINA YEARS
A Memoir by Helen Foster Snow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4

据纽约威廉·莫罗公司1984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平 原

旅华岁月
——海伦·斯诺回忆录
华 谊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61,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

书号：7003·111 定价：1.75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夫人海伦·斯诺的回忆录，记述作者1931年来华到1940年底离开亚洲期间的经历。作者来华后不久即与斯诺相识，后又相恋而结婚。夫妇二人作为外国驻华记者，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报道。他们与我国进步人士来往密切，同情并支持我国革命事业。1935年他们在北京经历了“一二·九”运动，后来又分别秘密访问延安，并都曾著书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抗战爆发后，斯诺夫妇与路易·艾黎等人为在中国开展工业合作社活动而奔波忙碌，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作者在书中回忆了这段期间的所见所闻，回忆了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我国革命领袖以及进步人士的交往。留下了可供读者参考的众多史料，并且对许多人物和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书中涉及的历史事实很多，我们未能一一核对，只对明显有误之处由译者作了注解，或作了少量删节，其余一概保持原作的本来面貌。

本书中的星花注系原书的注释，注码注则系译者所加。

作者的语

与我关于中国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也用威妥玛—贾尔斯拼法拼写中国的词语和地名。从十九世纪起直到1979年，一般采用的都是威妥玛—贾尔斯拼法。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推广一种新的拉丁化拼法，称作拼音。现在外国正在逐步开始采用这种新的拼法。例如，我最喜欢的省份陕西省用威妥玛—贾尔斯法拼写时写作“Shensi”，而用拼音法则写作“Shanxi”；与陕西接壤的山西省用威妥玛—贾尔斯拼法拼写时写作“Shansi”，而用拼音法则写作“Shanxi”。本书的末尾附有一个拼音一览表。（中译本已删）

本书中的对话，都是根据记忆写成的。直到不久以前，我的记忆力一直都被认为是超群的。其中许多对话写成于多年以前。我还曾借助于我的六本笔记，这些笔记是在我把尼姆·韦尔斯（我的笔名）私人文献递交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前，从我三十年代的档案资料中选编出来的。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这些文字记录是当时各个事件和局势的细节的独一无二的资料来源，甚至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仅仅这一点，也足以使我高兴地感到，我拖着那四十箱资料辗转半个世界并非徒劳无益之举。

鸣 谢

我谨向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致以谢忱。这个研究所保管了关于我在中国度过的那些岁月的档案资料。那些年月是那个伟大国家的历史中颇有争议的一段时光，而我的颇有历史价值的笔记则往往是仅有的在当时记下的文字材料。我也对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梅萨的G·L和谢里尔·福斯特·比肖夫表示感谢。他们两位负责整理我的文稿。

我特别感谢贝特西·博伊德·西内德拉。他承担了对《旅华岁月》的手稿进行编辑加工的艰巨任务，并以十分娴熟的技巧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作者。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朱
德与史沫特莱在
延安。



作者与康克清
在延安合影



作者与朱德
将军在延安合影
(1937年)。



作者与朱
德在北京会
面(1972年)



1979年在华盛顿把毛泽东的信件交给邓小平。



1977年在纽约与老学友黄华。

目 录

第一部分 上 海

第 一 章	1931年抵达上海.....	(1)
第 二 章	蔻蔻店谈“命”.....	(7)
第 三 章	外国记者.....	(25)
第 四 章	首次目睹战争.....	(34)
第 五 章	世上独一无二.....	(42)
第 六 章	上海意识.....	(51)
第 七 章	我和斯诺先生结婚.....	(58)

第二部分 北 京

第 八 章	抵达北京，1933年.....	(71)
第 九 章	北京的院落.....	(75)
第 十 章	在北京的生活.....	(81)
第 十一 章	泰亚尔·德夏尔丹.....	(87)
第 十二 章	女唐吉诃德.....	(94)
第 十三 章	艺术、文学和革命.....	(99)
第 十四 章	年终.....	(109)
第 十五 章	中国的乡村生活.....	(117)
第 十六 章	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22)
第 十七 章	北戴河：黄海边的传教士.....	(127)
第 十八 章	狐塔旁的鬼宅.....	(134)
第 十九 章	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41)
第 二十 章	行动.....	(151)
第 二十一 章	詹姆斯·贝特兰：来自新西兰的 罗兹奖学金学者.....	(164)

第二十二章	埃德加·斯诺去看“照耀中国的红星” …	(168)
第二十三章	插曲……………	(174)
第二十四章	1936年，首次西北之行……………	(179)
第二十五章	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10月，斯诺 归来……………	(189)
第二十六章	西安事变……………	(197)
第二十七章	圣诞日，虎头蛇尾的结局……………	(208)
第二十八章	创办《民主》杂志……………	(212)

第三部分 延 安

第二十九章	在红色中国——我的延安之行，1937年 …	(221)
第三十章	西安……………	(224)
第三十一章	阴谋……………	(231)
第三十二章	勉强逃脱……………	(238)
第三十三章	抵达红军前线……………	(247)
第三十四章	古城茅舍……………	(250)
第三十五章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254)
第三十六章	在延安的四个月……………	(263)
第三十七章	旅途十日……………	(270)
第三十八章	重逢在西安……………	(275)

第四部分 工业合作社

第三十九章	别了，北京……………	(283)
第四十章	工合：我们创办工业合作社……………	(285)
第四十一章	香港……………	(295)
第四十二章	播种“芥菜籽”的时候……………	(300)
第四十三章	别了，亚洲……………	(311)
结束语	……………	(319)

第一部分 上海

第一章 1931年抵达上海

《林肯总统号》航行在混浊的黄浦江中，逆水而上。船基本上是空的，只有21个年轻的美国人在甲板上急切地凭栏眺望，恨不得立即看到他们还从未见过的上海外滩的楼群。小伙子们穿着浆洗得笔挺的白色热带服装。一位来自安纳波利斯的海军上尉帮我提着高尔夫背包，一位殷勤的弗吉尼亚人（很高傲）帮我拿着网球拍。

这是1931年8月。我告别家人已三个星期，来到这个离家乡5,065英里之遥的地方。我打算最多在这儿逗留一年。可是最后我却直到1940年12月才离开亚洲，庆幸自己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一年得以离开。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是游客。要去马尼拉的那12位都是陆军或海军人员，而且大都是夫妇同行。那六名“英美烟草公司的小伙子”与英美烟草公司签了合同，要途经上海去一个使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二十里铺^①。以上海为旅行终点的人中只有两名妇女，我是其中之一。帕特·墨菲和我打算在旅馆合住一套房间，因为她的丈夫是长江巡逻艇队一艘炮舰上的海军上尉，正在长江上游值勤。

① 此处系音译。

所有的乘客都是初次到东方来。我是唯一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不是已经读过刚出版的赛珍珠写的《大地》吗？而且我还在研读E·T·威廉斯写的《中国：昨天和今天》。在国内的时候，我曾读过一位老资格的汉学家借给我的一份J·B·鲍威尔写的报告的打字稿。这份报告叙述了1923年鲍威尔和包括一些美国妇女在内的二十多人一起在蓝色快车上遭到土匪绑架的情况。我还带了一本E·卡恩写的很厚的专著《中国货币》，想读懂它，可是终于未读懂。除了在美国总领事馆当职员这个主要工作以外，我已在上海获得的工作之一是就白银代替黄金作为货币本位的好处写出报告，寄回被很不礼貌地称为白银院外活动集团的那个集团。

1929年，随着华尔街的崩溃，黄金兑换价的突然上升和白银的贬值，已使美国的白银开采业几乎陷于破产。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则因兑换率对他们有利，仅用很少的钱就生活得象王室成员一样阔气。我在白银院外活动集团的中坚组织美国矿业联合会任书记的助手时，薪水相当高。为了能到国外去旅行和写作，我已把大部分薪水积攒起来。我还通过了外交人员考试，想在海外谋求一个外交职位，以用上我的西班牙文、法文或意大利文。能够打的只有白银这张牌，而现在在白银院外活动集团的里德·斯穆特参议员和我父亲的一些斯坦福大学老同学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踏上了白银的国土。我父亲的那些老同学，如当时的在任总统赫伯特·胡佛，或者自己就是老资格的汉学家，或者认识一些老资格的汉学家。

我已在上海得到的第三个工，也与经济形势有着微妙的联系。在美国，大萧条正愈益严重，西雅图市外的美国邮船公司因旅客少而濒临破产。由于这种情况，以西雅图为基地的斯克里普斯一坎菲尔德报业集团给了我一个任务，不过限定我写的文章都必须是到“光辉灿烂而富有魅力的东方”去旅行、为复兴旅游业服务的，当时这项业务已是死气沉沉了。

随着我们踏入这个世界上第五个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生活水平骤然提高许多倍。由于一个美元值中国货币四至五元，当时，在上海的3,808个美国人以及在中国各地大约7,000美国人都生活得象王公贵族一样奢华，而世界其余地方都被“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受着折磨和煎熬”。我们也将加入这些美国人的行列。我很自信，也很愿意学习，可是最后我却不得不放弃为掌握复杂的货币问题所进行的努力（我始终不大同意那种认为大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本位造成观点）。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华界以前的五个月是这个属于外国的上海外滩的全盛时期，它的繁荣达到了顶峰。此后外滩再也没有过那种辉煌。外滩最高的大楼刚由英藉阿拉伯人沙逊建成。沙逊正在把资金转移到上海。这座大楼就是华懋饭店。大洋行的腰缠万贯的大班们在这家旅馆里租下了套间，互相请客吃饭。这些房间正因为旅游业的萧条而租不出去。

那是黄浦港的全盛时期。在可怜巴巴、蝙蝠翅膀状的帆船和颠簸起伏的舢舨中间，神气活现地锚泊着军舰和商船。到处都可以看到英国的米字旗高高飘扬，日本的太阳旗和美国的星条旗则知趣地在闷热寂静的空气中低垂着。当《林肯总统号》徐徐行进时，我们向每一艘驶过的船只挥手。甚至郁郁寡欢的、爱干净的日本人也向我们挥手还礼，尽管他们好象总是保留着另一只手在甲板上晾晒他们洗净的衣物。

在绵延几英里长的码头和货栈里，几乎所有的货物都是靠人力搬运的，而且所有的搬运工又都是中国人。黄浦江岸是受青红帮控制的。任何人都不敢怠慢他们，甚至连日本人也不敢小觑他们。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曾一度在东方控制了贸易。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1818年创办的康涅狄格州的拉塞尔公司实现的。在外滩许多仓库的一侧，拉塞尔公司的红砖货栈象城堡一样屹立着，占据了好几个街区。作为美国传统一部分的第一艘远航中国

的美国船是在1784年乔治·华盛顿生日那天出发的，这甚至比拉塞尓公司还要古老。

站在《林肯总统号》上，我们觉得我们也是这个古老传统的一部分。我站在船头上，象一只古老的快速帆船的船头雕饰一样，面对着未来，体魄健壮而又雄心勃勃。到中国来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大的大事，我要使它最充分地发挥效益，一分钟也不浪费。当船向码头靠近的时候，我把一只脚放在栏杆上，迫不及待地要尽快走下甲板，踏上中国的土地。

尽管我们都得到过忠告，说外国人在旅行时为了保全面子应乘头等舱，并且也都为头等船票付了500美元，但是，按照美国传统，却不应去住新建的华懋饭店，而应去古老的礼查饭店。礼查饭店是由一艘美国快帆船的船长和船上的木工建造起来的。它曾经是东方最好的旅馆。我说服了同来的人员，都去礼查饭店。

我是怎么会知道礼查饭店的呢？这是一个新闻界王朝的所在地。来自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密勒、鲍威尔和斯诺，接踵而来这儿组成了这个王朝。我带有我父亲的老同学为我写给在东方的报界老前辈托马斯·密勒和他的学生J·B·鲍威尔的介绍信。密勒为了给《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义和团运动的情况，于1900年到达上海以后就住在这里。1917年，密勒请J·B·鲍威尔来协助创办《密勒氏评论报》时，鲍威尔也住在这里。《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出版物。（我立即被聘为该报的书评撰稿人——这是我的第四个工作，以后我又成了这家周报驻北京的记者。）

我并未带写给他们的学生埃德加·斯诺的介绍信。斯诺在1928年也来到了礼查饭店。当时他年仅22岁，却担任了助理编辑。但是我有一个贴有他的名签的夹子，里面装的全是他的文章，其中有些是我从《纽约先驱论坛报杂志》上剪下来的。我在美国矿业联合会工作时的一项职责就是从那份报纸上剪下有用的材料。当我拿着剪刀，坐在桌子边准备剪报时，我曾经想：为什

么我不能也到处采访，也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我甚至想过（我那种想法是多么错误！），与埃德加·斯诺的文章相比，这家报纸的女业主奥格登·里德夫人和女编辑威廉·布朗·梅洛尼也许更喜欢一个女性写的文章。

我们上岸的地点离礼查饭店很近，步行即可到达，但是，我们得到的忠告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得乘人力车。当时，我们还以为是一群歹徒向我们发动了袭击，后来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是一拥而上抢生意的人力车夫。坐上人力车后，我们不得不在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而又程度不同地身患疾病的乞丐中间穿行。美国邮船公司来码头接我们的那个人站在他乘的人力车上，回头向我们招手。“现在在中国，谁都不敢动外国人一根毫毛”，他嚷嚷道。“只不过看起来有点危险而已。不用理睬他们。”

到了礼查饭店门前，我们乘坐的二十多辆人力车在狭窄的街道两旁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同所有初来乍到的人一样，向车夫付了多得跟赎身金一样的小帐，为总算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松了一口气。我们的所在地是黄浦江的拐弯处。正好在礼查饭店对面的河堤上有一座庞大的城堡一样的旧建筑物，窗框的装饰富丽堂皇。车夫在这座建筑物笨重的大门边让我下车时，我看着这座无人居住的、空空荡荡的大楼，不禁有点不寒而栗。

“这个怪吓人的大楼是干什么的？”我问。

有人告诉我：“这儿原先是沙皇的领事馆。三年以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小小的枪战。”显然，苏联领事把他的职员都藏在大楼里面，有150名从前的哥萨克军官，穿着沙皇时代的军装来到这儿，企图占领这座大楼。他们想在上海建立逃亡者自己的流亡政府。警方没有介入，但是苏联人从大门内向外开了枪，哥萨克撤离了现场。这可能是俄国内战的最后一幕。1927年，属于国民党的中国人在广州杀害了一些苏联领事人员，外交关系当然也就破裂了。（1973年当我在离别了30多年之后重返上海时，我发现这两座美国建筑和苏联建筑显得更古老了，但却并不比三十多